

文白对照
全译本

曾国藩评传

(民国)
黎何
锦贻
熙焜
//
校著

下

中国
社会
出版
社

青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
蒋介石毕生研究曾国藩





曾國藩評傳

(民國)

黎何
錦貽
熙焜

校著

中國社會出版社

十五、教育思想

〔原文〕

曾公除居京曾教弟读书外，就狭义之教育而言，殊少实际从事教育，惟其遗集中时有关于教育之理论。兹为明了曾公之教育思想，特就其遗集中所言者依次叙述之。

〔译文〕

曾国藩除了在京城时曾教他的弟弟读书以外，就以狭义上讲的教育而言，很少实际从事教育，只有在他的遗著中不时地有关于教育的理论。在这里，为了清楚曾国藩的教育思想，特地把他遗著中的有关理论依次叙述。

教育起源论

〔原文〕

就教育之起源而言，公答刘孟容一书，即已言及；如云：“自其初而言之，太和氤氲，流行而不息，人也，物也，圣人，常人也，始所得者钧耳。人得其全，物得其偏，圣人者既其全，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，而其习又无毫发累，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，夫是之谓‘尽性’也。推而放之凡民而准，推而放之庶物而准，夫是之谓‘尽人性’，‘尽物性’也。常人者虽

得其全，而气质拘之，习染蔽之，好不当则贼仁，恶不当则贼义，贼者日盛，本性日微，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。学者何？复性而已矣。所以学者何？格物诚意而已矣。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折之，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。”（《书札》卷一）

盖公受宋学之影响，其宇宙观有理一气殊论，其人性论亦有所谓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。教育之缘起，则在变化吾人气质之性以复于本然之性也。故其教育起源论，亦自有其哲学上之根据。

公虽承认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，以为气质之性可以变化，但亦受孔子上智下愚说之影响，以为可以教育者，率为中材。故公在《箴言书院记》中云：“窃尝究观夫天之生斯人也，上智者不常，下愚者亦不常，扰扰万众，大率皆中材耳。中材者，导之东而东，导之西而西；习于善而善，习于恶而恶。其始瞳焉无所知识，未几而骋嗜欲，逐众好，渐长渐贯，而成自然。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，渐流渐广，而成风俗。风之为物，控之若无有，歛之若易靡，及其既成，发大木，拔大屋，一动而万里应，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。先王鉴于此，欲民生蚤慎所习，于是设为学校以教之。琴瑟鼓钟以习其耳，俎豆降以习其目，诗书讽诵以习其口，射御投壶以习其筋力，书升以作其能，而郊遂以作其耻。故其高材则道足以济天下，而智周万汇；其次亦不失为主壁自伤之士。贾生有言：‘习与正人居之，不能毋正，犹生长于齐，不能不齐言也。’其不然欤？”（《文集》卷三）

惟有中材，始能导之东而东，导之西而西，可见曾公并非主张“教育万能说”者。至谓教育之兴起，由于先王“欲民生蚤慎所习”，不但根据孔子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之说；而且与

近日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 (James) 之说暗合，盖詹姆斯因主张教育之目的即在有用习惯之养成也。

〔译文〕

就教育的起源来说，曾国藩在答刘孟容的一封信中已经说过，他说：“从天地刚刚诞生时讲，那时天地间的太和之气游行不止，无论人还是物，无论圣人还是常人，开始得到的都是气，人得到的比较全，而物得到的较偏，圣人得到的气不但全，而且气质最清最厚，并且他的习性使他的气质又没有任何损伤，于是他们所说的施行仁义，其实是他们‘尽性’而为，这个道理推广到凡民身上也是适用的，推广到万物之中也是适用的。这就是所说的‘尽人性’‘尽物性’，常人得到的气虽然全，然而气质有局限，加上习气的沾染，爱好不当就会有损于仁，厌恶得不对就会有害道义，贼气日渐盛大，本性日渐衰微，因此学问也就由此产生，学习为了什么呢？只不过是恢复本性罢了。如何来学呢？那就要用格物诚意的办法。格物就要剖析仁义的差别等级并细细区分，诚意就要举出合于仁义的方法并努力照那样做。”（《书札》卷一）

曾国藩受宋学的影响，他的宇宙观里有理一气殊论的观点，他的人性观中又有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。教育兴起的原因，就是改变我们的气质之性而恢复我们的本然之性。所以他教育理论的起源，自然有他哲学上的依据。

曾国藩虽然承认有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，认为气质之性可以变化，但他也受孔子上智下愚学说的影响，以为可以教育的，应该是才智中等的人，所以他在《箴言书院记》中说：“我曾经暗中观察过天下的人，才智上乘的会与众不同，才智低下的人与众不同，只有这纷纷扰扰的大众，大部分都是才

智中等的人。才智中等的人，你引导他向东，他就向东，你引导他向西，他就向西；向善人学习就变善，向恶人学习就变恶。他刚出生时什么也都不懂，过不了多久就开始放纵自己的嗜欲，追逐大众的喜好，越长大越这样，最后形成自然。由一两个人开始，越流传越广，最后形成风俗。风对物体的作用，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，抓也抓不住，等他形成气候以后，就会吹倒大树，掀起大房屋，动一下就是几万里内也有反应，用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能抵御住他。先王根据这种情况，希望百姓能早点对自己的习惯有所警慎，于是就设立学校来教导他们，用琴、瑟、钟、鼓来锻炼他们的耳朵，用切豆子来锻炼他们的眼力，用诵读诗书的方法来锻炼他们的口舌，用射箭投壶来锻炼他们的筋力，有能力的就让他们所读的书不断增加，而把半途而废作为一种耻辱。所以那些高材的学生，可以拯救天下，将德才智慧传于万物。才智广博稍微差一点儿的，也不失为能自我完善的人。贾谊有句话说：‘习惯和正人君子呆在一起，不可能不变得正派，就象在齐国长大不可能不说齐国话一样。’难道不正是这样吗？”（《文集》卷三）

只有才智中等的人，才能引导他向东他就向东，引导他向西他就向西，可见曾国藩并不是主张“教育万能说”的人，至于说到教育的兴起，由于先王希望“早点让百姓对自己的习惯有所警慎”，因此这不但是根据孔子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的学说，而且和近来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（James）的学说暗中相合，詹姆斯主张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养成好的习惯。

教育沿革论

〔原文〕

就教育之沿革而言，公《送唐先生南归序》，叙述颇详。如云：“古者道一化行，自卿大夫之弟子与凡民之秀，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。于乡有州长党正之侑，于国有师氏保氏。天子既兼君师之任，其所择，大抵皆道艺两优，教尊而礼严。弟子挹衣挹隅，进通必慎。内以有所惮而生其敬，外缉业以兴其材。故曰：‘师道立而善人多’，此之谓也。周衰，教泽不下流。仲尼干诸侯，不见用，退而讲学于洙泗之间，从之游者如市，师门之盛，振古无侔，然自是人伦之中，别人所谓先生徒众者，非长民者所得与闻矣。”（《文集》卷一）

此言中国古代政教合一。教育普及，自周衰以后，孔子教学洙泗，门人虽众，政教已离而为二矣。公又云：“仲尼既没，徒人分布四方，转相流衍。吾家宗圣公传之子思、孟子，号为正宗，其他或离道而专趋于艺。商瞿授《易》于馯臂子弓，五传而为汉之田何。子夏之《诗》，五传而至孙卿，其后为鲁申培。左氏受《春秋》，八传而至张苍。是以两汉经生，各有渊源。源远流岐，所得渐纤，道亦少裂焉。有宋程子朱子出，绍孔子之绝学，门徒之繁，拟于邹鲁。反之躬行实践，以究群经要旨；讲求万物之理，以尊闻而行知。数百千人，粲乎彬彬。故言艺则汉师为勤，言道则宋师为大，其说允已！”（同上）

此言仲尼没后以至汉、宋教学之情形。汉代重考据，故言

艺则汉师为勤；宋代重义理，故言道则宋师为大。揆曾公之意盖汉师乃经师，而宋师则人师也。

公又云：“元、明乃我朝之初，流风未坠。每一先生出，则有党徒景附，虽不必束修自上。亦循循隅坐，应唯敬对。若金、许、薛、胡、陆稼书，张念芝之俦，论乎其德，则暗然；讽乎其言，则犁然而当理；考乎其从游之徒，则践规蹈矩，仪型乡国。盖先生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，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，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。

《诗》曰：‘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’诚珍之也。今之世，自乡试，礼部试，举主而外，无复所谓师者。间有一二高才之士，钩稽故训，动称汉京，闻老成昌为义理之学者，则骂讥唾侮。后生欲从事于此，进无师友之援，退犯万众之嘲，亦遂却焉。”（同上）

此言元、明以及清代之学风。清初程、朱派犹盛，故师弟多以义理相助；乾、嘉以后，汉学大盛，当时学者欲多钩稽故训，故义理之学少衰。

〔译文〕

就教育的沿革而说，曾国藩在《送唐先生南归序》中，叙述得十分详细，比如他说：“古时的人以一为道以化其行，卿大夫的弟弟和凡民中优秀的人，都作为上等人而安排老师来教他们。在乡里的学校中，有州长党正等人作为教师，在国家的学校中有师氏保氏等专门任教的人。天子既然同时是他老师的国君，那他选的老师，一般都是道艺两优，既端庄严正又礼法严明。对弟子的小动作，进出入的规矩，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。于内让他们有所忌惮而变得端敬，于外让他成就功业以发挥他们的才干，所以说：‘师道树立了那善人就会多起来’，周

朝衰亡，但对下层人的教育还没开始，孔子自荐于诸侯，却不被任用，于是他就在民间讲学，跟从他游历的人就像闹市一样熙熙攘攘，师门如此兴盛，自古无人能比，然而从那以后，老百姓中有人说先生的学生很多的，不是普通的人所能了解和听到的了。”（《文集》卷一）

这是说中国古代是政治与教育合一的，教育普及，自从周衰亡以后，孔子在民间教学，学生虽然很多，但政治和教育已一分为二了。曾国藩又说：“孔子死后，他的学生分布在各个地方，不断的流传繁衍。我们家族的祖先是子思、孟子那里求学的，号称正宗，其他的人有的就背离了正道而专门趋向于艺了，商瞿把《易》教授给子弓，经世五代传到了汉朝的田何那里，子夏的《诗经》，经过五代传到了孙卿，后来又传到鲁申培。左氏的《春秋》，经世八代的流传而到了张苍。所以两汉时期的习经儒生，都各自有自己的渊源。起源越远，分流越多，传下来的就越少，道义也就有了一些分化，后来到宋朝出现了程子和朱子，继承孔子的绝学，门徒众多，就象孔子那时一样。并且又亲身实践，来研究经典的义意和宗旨，讲求万物的道理，用经典来指导实践。成百上千的人，都彬彬有礼，所以说到艺那要算汉朝的老师知识最丰富，说到道要算宋朝的老师最博大，这种说法很有道理！”（同上）

这讲的是自孔子以后到汉，宋朝教学的情况，汉代重视考据，因此说要论艺，汉代的老师最勤勉，宋代十分注重义理，因此说宋代的老师就道来讲最为博大，根据曾国藩的看法来讲，汉代的老师是经师，而宋代的老师是人师。

曾国藩又说：“元、明和我朝刚开始的时候，流行的风尚一直没有改变，每当有一个先生出现，就会有許多党徒依附于他，虽然不必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追求上进，但也规规矩矩地相

对而坐，回答问题毕恭毕敬。而象金、许、薛、胡、陆稼书、张念芝等人，说起他们的道德那就十分的不明朗；他们的言论又似乎十分明白而合乎道理；看看跟他们学习的人，也都遁规蹈矩，仪表端庄。这些先生的教育成效虽然仅仅是让人不犯罪，使顽劣之人有所忌惮并略知廉耻，但这些都都可以说是诸位先生讲学以及其门人努力附和的结果。

《诗经》说：‘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’这的确是真理，当今之世，从乡试到礼部试，除了殿试外，不再有什么真正的老师了，偶尔有一二个才高的人，都紧紧抓住古时的训戒，动不动就说汉朝时如何如何，听说有倡导义理之学的，就讥讽、唾骂、羞辱不止，青年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既不会有师友来帮助他，而同时又会遭到万人嘲笑，也确实不好办啊！”（同上）

这讲的是元、明以及清代的学风。清朝初年，程、朱学派还十分兴盛，所以师傅徒弟还都讲求义理。而乾隆、嘉庆以后，汉学大大兴盛，当时的学者都要多以古时的理论为依据，所以义理的学说就有些衰退了。

教育目的论

〔原文〕

观曾公所述中国过去之教学情形，虽不如阅近人王凤喈氏所作《中国教育史大纲》之翔实，亦可得一概括之观念。其尤足以注意者，则曾公于吾国教育确具有简括之历史观也。

教育之起源，既在养成人民之良好习惯，则曾公之教育目的论，当亦可推知矣。公作《江宁府学记》尝云：“将欲黜邪

愿而反经，果操何道哉？夫亦曰：‘隆礼而已矣’。先王之制礼也，人人纳于轨范之中，自其弱齿，已立制防。洒扫沃盥有常仪，羹食肴馔有定时，绶纓绅佩有恒度。既长，则教之冠礼，以责成人之道；教之昏礼，以明厚别之义；教之丧祭，以笃终而报本。其出而应世，则有《士相见》以讲让，《朝覲》以劝忠。其在职，则有三物以兴贤，八政以防淫。其深远者，则教之乐舞，以养和顺之气。备文武之容，教之《大学》，以达于本末始终之序，治国平天下之术；教之《中庸》，以尽性而达天。故其材之成，则足以辅世长民。其次，亦循循绳矩，三代之士，无或敢遁于奇袤者，人无不出于学，学无不衷于礼也。”（《文集》卷四）

揆其意旨，盖谓隆礼为养成善良习惯之方法，而养成人士之善良习惯，或足以辅世长民，为人民之表率。或亦循循绳矩，不失为自好之士，则礼教之目的也。故其教育目的论，偏重人格之培养，公民之训练，甚为明显。

〔译文〕

曾国藩所讲述的中国过去教学的方式，虽然不如近人王凤喈所写的《中国教育史大纲》中记载的那么翔实，但也可以给人一个总的观念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曾国藩对我国的教育确实有一个简明概括的历史观。

教育的起源，既然是为了养成人民的良好习惯，那曾国藩关于教育的目的，也可以从中推知，曾国藩在《江宁府学记》中曾写到：“想要去除邪恶而奉行经典，用什么样的办法好呢？有人说：‘只要推行礼教就可以了’。先王制定礼教，人人都被纳入规范之中，从他小时候开始，就有了规矩。洒、扫、洗、漱有固定的方法，吃饭有规定的时间，衣服花饰的长短有统一

的长度。等他长大以后，就对他实行礼教，以后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；教给他婚礼，让他明白厚、薄、轻、重；教给他丧祭之礼，使他能尽终尽孝。如他作官，那就有三物帮他变得贤良，有八政以防他淫乱。从深远的方面考虑，就教给他乐舞，以培养他的和顺之气。让他文武兼备，就教他《大学》，使他明白本末始终的顺序，掌握治国平天下的方法；教他《中庸》，使他能尽全部精力而达到天性，所以他的才干培养成后，足可以辅佐天下、安定百姓，其次，他也会循规蹈矩，他家三代之内，没有敢学习歪门邪道的，人人都努力学习，所学习的都是礼法教义。”（《文集》卷四）

总归纳他的意思，就是学习礼法是培养善良习惯的方法，以养成人的善良习惯，或者可以使他辅佐天下安定百姓，或为人们的表率；或者使他循规蹈矩，成为洁身自好的人。这就是礼教的目的，所以曾国藩认为教育的目的应当偏重于人格的培养，公民的训练，是十分明显的。

教育材料论

〔原文〕

公虽演究义理，提倡礼教，于考据词章之学，亦未尝忽略，此于其教育材料论可以知之。公督直时，曾作《劝学篇》以示直隶士子。其中有云：“为学之术有四：曰义理，曰考据，曰辞章，曰经济。义理者，在孔门为德行之科，今世目为‘宋学’者也。考据者，在孔门为文学之科，今世目为‘汉学’者也。辞章者，在孔门为言语之科，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

是也。人之才智，上哲少而中下多。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，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，是以君子贵慎其择而先其所急，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，则莫急于义理之学。

凡人身所自具者，有耳目口体心思；日接于吾前者，有父子兄弟，夫妇；稍远者有君臣，有朋友。为义理之学者，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，而五伦各尽其分。又将推以及物，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，而无憾于伦纪。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，虽唐、虞之盛，有不能逮。苟通义理之学，则经济该乎其中矣。程、朱诸子遗书具在，曷尝舍未而言本，遗新民而专事明德？观其雅言，推阐反复而不厌者，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，居敬以养德；穷理以致知，克己以力行，成物以致用。义理与经济，初无两术之可分，特其施功之序，详于体而略于用耳。

今与直隶多士约；以义理之学为先，以立志为本。取乡先达杨、赵、鹿、孙数君子为之表。彼能艰苦、困难、坚忍以成业，而吾何为不能？彼能置穷通、荣辱、祸福、死生于度外，而吾何为不能？彼能以功绩称当时，教泽膺后世，而吾何为不能？洗除旧日暗昧卑污之见，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，视人世之浮荣微利，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，不忧所如不耦，而忧节概之少贬。不耻冻馁在室，而耻德不被于生氏。志之所向，金石为开，谁能御之志既定矣，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，使吾之所见，证诸古制而不谬；然后求所谓辞章者，使吾之所获，远诸章札而不差。择一术以坚持，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。其或多士之中，质性所近，师友所渐，有偏于考据之学，有偏于辞章之学，亦不必遽易前辙，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。其文经史百家，其业学问思办，其事始于修身，终于济世。百川异派，何必同哉？同达于海而已矣。”（《杂著》卷四）

于教育之目的、材料及方法，此均有所叙及。所谓“其事

始于修身，终于济世”，教育之目的论也。所谓“为学之术有四：曰义理，曰考据，曰辞章，曰经济。”所谓“其文经史百家；”教育之材料论也。虽“以义理之学为先”，然“多士之中”，“有偏于考据之学，有偏于辞章之学，亦不必遽易前辙。”以为“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域”，故公虽提介义理之学，于考据词章之学固亦未尝忽也。谓“其业学问思辨”，则属于教育方法论矣。

〔译文〕

曾国藩虽然演绎研究义理，提倡礼教，但是对于词章、考据的学习，也不曾忽略，这点从他的教育材料论中可以得知。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时，曾写过《劝学篇》来劝勉教育自己的学生。其中说到：“学术有四种：义理、考据、辞章、经济。义理，从孔子的学说来讲就是德行之学，就是当今被看作是宋学的学问；考据，从孔子的学说看，指的是文学，也就是当今被看作是‘汉学’的学问。辞章，从孔子学说的角度看，指的是有关言语的科学，从古代的艺术文到现在的诗、辞、歌、赋都包括在内。人的才智，属于上乘贤哲的人少，而居于中下的人比较多。人的一生不过几十年，势必不能遍观各种学术并都学会，所以君子应慎重选择那些自己迫切需要掌握的学问，选择那些身心健康有益的学说，而不要着急去学义理之学。

人们本身就自然具备的，有耳、眼睛、嘴、身体、心思，每天生活在一起的，有父、子、兄弟、夫妇；稍微远一点儿的有君、臣、有朋友。学习义理之学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使耳、目、口、体、心思能各自发挥他们的作用，使五伦都尽到他们的本分，要将这些推及他物，使百姓都能修得善行，而于伦常纲纪没有缺憾。如果真能使整个世界的人都在伦常纲纪上没有

缺憾，那么即使如唐尧、虞舜那时的世盛，恐怕也比不上。如果学通义理之学，那么经济也在其中了，程、朱的遗书现在还都在，他们又何尝说过舍末而逐本，只将明德之学教给后人？读他们的言辞，不厌其烦地反复推敲，不外乎希望能够立志从而确立自己的根基，端正用来修养品德；研究事理而获得知识，强迫自己努力做人，成就事物最终得以应用。义理和经济，开始时并不是分作两种学问的，只不过是根据他们发挥功效的前后顺序，对于本体详加阐释而对应用说得比较简略罢了。

现在直隶地区的大多数士人，都是把义理之学作为先要学的，把立志作为根本。并且把本乡先辈中的杨、赵、鹿、孙等人作为表率。他们能忍受艰苦、困难，坚忍到底并成就功业，而我为什么不能？他们能够把穷通、荣辱、生死置之度外，而我为什么不能？他们能凭功绩著称一时，并教泽膺后世，而我为什么不能？去除以前那些暗、昧、卑、污的见解，雄赳赳地直奔广阔的光明天地，把世人看重的虚浮的荣耀和微薄小利，都看作蚊蝇一样，过目而不留，不为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而担忧，而担忧自己缺少气节。不以饥寒交迫为耻，而以自己没有品德为耻。志气所到的地方，连金石也能断开，谁能抵挡已经确定的志向呢？而后从先儒那里学习考据，对照我的见解，有古制为佐证而不改产生谬误；然后在辞章上下功夫，使我获得的知识，清楚地表达在文章中而没有偏差，选择一门学问坚持学下来，而同时别的学术也不偏废。也许在众多士人中，因为性格的原因，或师友的影响，有人偏重于考据之学，有人偏重于辞章之学，这也没有必要完全改变自己的学术，因为两种方法都可以进入圣人之道。那些文经史百家，他们学习提问思考，都以修身为开端，最终达到济世的目的。各种学派

都有自己的特点，何必非求得相同呢？只要最后都能达到同一个目标就可以了。”（《杂著》卷四）

对于教育的目的，材料和方法，在这里都谈到了，所说的“从修身开始，最终达到济世的目的”，就是教育目的论。所说的“学术有四种：义理、考据、辞章、经济”和所说的“经史百家”说的是教育的材料。虽然“以义理之学为最重要的”然而“众多士人当中”“有的偏重于考据之学，有的偏重于辞章之学，也没必要马上改变”以为“这两个途径都可以进入圣人之道”所以曾国藩虽然认为义理之学重要，但是对考据、辞章之学也未曾忽视过。而他所说的“学习提问思考”则是属于教育方法论方面的问题。

论教育之方法

〔原文〕

于公所谓“其或多士之中，质性所近，师友所渐，有偏于考据之学，有偏于辞章之学，亦不必遽易前辙”等语中，知公于教育之方法，亦以启发个性为主。于公《江宁府学记》中隆礼之说，知公于教育之实施，主张由生活习惯方面入手。而公《答刘孟容书》云及所以为学之道，在格物诚意，“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，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仁义者而力卒之”，更知公于教学之道，知行并重，不仅以学问思辨为然。凡此种种，均曾公教育方法论中之极堪注意者。考其所以，盖曾公之教育起源说，本于人性论，于吾人之个性，已有相当之注意。而其教育目的论，与其淑世之人生观亦有密切之关系，故其教

育方法，不仅重知识之研求，兼重行为之表现。

教育之方法，往往随教者而异。公于教师之才德，甚为注意，盖亦有见于此也。其言曰：“孔子所谓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上智下愚不移者，凡事皆然。即以围棋论：生而为国手者，上智也；屡学而不知局道，不辨死活者，下愚也。此外皆相近之姿，视乎教者何如。教者高，则习之而高矣。教者低，则习之而低矣。以作字论：生而笔姿秀挺者，上智也；屡学而拙如姜芽者，下愚也。此外则皆相近之姿，视乎教育何如。教者钟、王，则众习于钟、王矣。教者苏、米，则众习于苏、米矣。推而至于作文亦然，打仗亦然，皆视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长，而众人之习道之为转移。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，而徒致概上智之不可得，是犹执策而叹无马，是真无马哉？”（《日记》——己未十月）

持此与其所谓：“凡做好人，做好官，做好将，俱要好师好友，好榜样相较，如出一辙。故知公之教育方法中，以慎重教师人选为第一要务。

公于教学中之课程问题，亦尝论及。如云：“余从前教诸弟，常限以功课。近来觉限人以课程，往往强人以所难。苟其不愿，虽日日遵照限程，亦复无益。故近来教弟，但有一‘专’字耳。”（《家书》卷一——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）

又云：“欲别立课程，多讲条规，使诸弟遵而行之，又恐诸弟习见而生灰心。欲默默而不言，又非长兄督责之道。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，近来则只教以‘有恒’二字。”（《家书》卷二——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）

据此，吾人足见曾公于课程之限制，并不坚持。其诲人也，惟以“专一”与“有恒”为主，盖亦主张“自由研究”，“自动学习”者。其教育思想颇尊重个性之发展，于此亦可得